

外国语言文学 与文化论丛

(二)

四川大学外文系



四川 大学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 与文化论丛

(二)

四川大学外文系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9·成都



责任编辑:张 晶

封面设计:冯先洁

版式设计:张 晶

责任印制:李 平

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论丛(二)

四川大学外文系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29号)

新华书店经销 郫县犀浦印刷厂印刷

850mm×1168mm 1/32 开本 8.75 印张 2 插页 240 千字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7-5614-1867-1/H·89 定价:16.00元

前 言

以文集的形式,将我系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最新成果介绍给大家,同时也推动我系科研工作的发展。这是我系近几年来的主要工作之一,也是这本书的出版目的。为此,我们继《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论丛》(一)之后,又编辑了第二辑。

《论丛》汇集了语言学、外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系英语、日语、俄语、德语等专业和语种的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从事的工作,也体现了他们在外国语言文学这一领域中的奋斗和奉献精神。该《论丛》的作者中有长期从事研究生教学、在教学和科研工作方面硕果累累的老教师,也有科研成果卓著的中年学者,还有不少是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崭露头角的颇富实力的青年学者和教师。我们在编辑中也注意收集了研究生的优秀论文。《论丛》所收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丰富了我国在外国语言、文学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对促进外语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川大学出版社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使得本书能如期顺利出版。谨在此表示感谢。

四川大学外文系
1998年11月

目 录

语 言

- | | |
|----------------------------|-----|
| 文化哲理和语言构造 (3) | 张维鼎 |
| 跨文化交际中的礼貌原则 (17) | 段 峰 |
| 科技语体、公文事务语体、政论语体的基本特征 (22) | 戴 姗 |
| 德语形容词的名词化 (31) | 阎 卫 |
| 中日同形語の対照研究 | |
| ——同形語の相違の諸相 (38) | 高晓钢 |
| 论规约含义 (52) | 徐开彬 |

文 学

- | | |
|--|----------|
| 华裔美国文学新星——谭恩美 (67) | 林必果 |
| 大小宇宙和约翰·多恩的情诗 (74) | 李 毅 |
| Knowledge and Self-image of Lambert Strether in
Henry James's <i>The Ambassadors</i> (82) | Jian Shi |
| 20 世纪加拿大英语诗歌述评 (96) | 朱 徽 |
| 一唱三叹, 惊天动地 | |
| ——评莎士比亚历史悲剧《理查二世》 (108) | 罗义蕴 |
| 英诗创作中的音律重复手法 (120) | 张基珮 |
| 狄更生诗歌的意境 (127) | 何 萍 |

2 目 录

莎翁十四行诗第九首第九行考证 (137)	叶 英
“归属感”在奥尼尔戏剧中的表达 (139)	查日新
成语在文学作品中的修辞运用 (143)	谢 青
尊严的光辉	
——读法国作家维尔高尔《海的沉默》 (151)	敖 敏
「蛇性の淫」における中国白話小説の受容 (158)	陈晓琴
痛苦的醒悟	
——《苍蝇》读后感 (171)	伍 锋
《荒原》的哲学透视 (177)	邢 昭

文 化

日语与日本人

——从日语表达看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 (191)	胡德友
北美印第安人的赠财宴 (199)	邱惠林

译·教·学

表达——译文成败的关键 (207)	肖安溥
谈谈社科期刊文章标题的英译 (222)	李国林
论翻译技能的获得 (227)	彭 俊
论外语教学中语言错误的处理 (233)	文清会
精读课在高年级英语教学中的地位 (242)	陈 杰
如何应对英语演讲中的即席演讲和答问	
——兼评李舒在“21 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	
中的相关表现 (248)	任 文
论评判性阅读能力的培养和习得 (254)	黄绍芬
外语电化教学可借鉴的新技术	
——模拟音频技术和数字音频技术的新发展 (264)	饶 坚

语言

文化哲理和语言构造

张维鼎

语言的本质是社会性的,是人与社会、与世界的联系纽带。人按照他的思维、意识和无意识,即他的文化哲理心态来影响语言构造;又按照语言构造来理解世界,从而强化自己的文化哲理。文化哲理和语言构造之间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在语言的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反映,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任何对语言构造的研究,如果忽略了它与文化哲理的关系,都无法贴近语言的现实,进入语言的本质层次。西方的结构形式分析法可以系统地研究语言构造的基本框架,却无法呈现其血肉丰满的全貌。继转换生成语法之后,各种流派的语法都作出不同的努力来克服形式分析法这方面的缺陷。

汉语是人文性的语言,缺乏形式系统。结构形式分析法的缺陷就更加突出。中国文化语言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的。本文试图在分析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汉语、英语在构字、构词、构句方面的句法特征与文化心态的关系作初步的讨论。

一、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 与语言理论及沃尔夫假说

布留尔是法国的人类语言学家,曾长期生活在土著人的社会研究其思维和语言。他发现原始人的思维是具体的思维,而不是

4 语 言

抽象思维,即不会用抽象概念的前逻辑思维。他后来补充说明,原始人不是不会用抽象概念,而是对文明人运用抽象思维所提的问题不感兴趣。这就是说,原始人的文化心理倾向于具体思维。他声称:“在人类社会,不存在为铜墙铁壁所隔开的两种思维形式,一种是原逻辑思维,另一种是逻辑思维,但是,在同一社会里,常常在同一意识中存在着不同的思维结构。”^①(原始思维,10~11)

他发现,原始人对具体思维的偏爱使“原始语言”带有比现代“文明语言”更多的具体成分(语言其实不存在原始与文明之分)。比方说,澳大利亚“土著”的语言一般无树、鱼、鸟等抽象的属名。他们宁愿对每一种树、鱼、鸟都给以专门的名称。塔斯马尼亚人对每种灌木、橡胶树都给予专门的称谓。他们的语言无表抽象性质的形容词,如硬的、软的、热的、冷的、圆的、方的、长的、短的,却可用语义具体的形容词来表示它们。如用“像石头一样”来表示“硬”,“像大腿一样”表示“长”,“像月亮一样”表示“圆”。这种隐喻式的表达在我国少数民族的诗词里也是十分常见的。拉普人的言语中有20个词表示不同的冰,10多个词表示冷的不同程度,41个词表示不同形式的雪,但是却无泛指“冰”、“冷”、“雪”抽象概念的词。布留尔还发现,原始人的动词也是具体的。比如要表达“一个人打死了一只兔”,狩猎的原始人不会用概括性的动词,而是用不同的具体动词来分别说明:是坐着打死,还是站着打死;是有意打死,还是无意打死;是用弓箭打死,还是用火枪打死等等。

布留尔的研究证明,原始人对具体思维的文化偏爱心态确实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语言构造。文化心态如果成为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一种社会集体意识或者潜意识时,我们不妨把它看成一种社会文化哲理。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就语言而言,它不是意味着去集约定,然后相沿成俗。美国语言哲学家阿理思顿(William P. Alston)在讨论语言符号时曾说:“……语言变化似乎是无意识的,一种在没有任何人和群体有意识建立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形成的习惯。”^②(阿理思顿,1964:57)他还强调这种习惯是基于某些规则概念。布留尔关于原始文化和语言的研究告诉我们,所谓“一种在没有任何人和群体有意识建立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形

成的习惯”其实就是文化心态所孕育的文化哲理。语言是思想的现实,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思想”既来之于抽象思维也来之于具体思维。正如布留尔后来进一步观察后所说,在对待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许多事物时,原始人还是运用了人所共知的抽象思维;只有涉及认识问题时,才运用具体思维。具体思维与抽象思维之间不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分,正如喝茶和喝咖啡一样,是文化选择而不是优劣之分。当然文化心理倾向主要决定于文化生存形象。格里姆说过,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

在布留尔的代表作《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出版 10 年后,美国人类语言学者萨丕尔在其力作《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中说,“许多原始的语言,形式丰富,有充沛的表达潜力,足以使现代文明人的语言黯然失色”^③。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认为“思维只是潜伏在语言的分类法和形式中,而最终才可以从语言中看出思维”^④。进而,他认为现实世界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语言习惯上的。这是一个长期研究印第安语言的知识精湛的学者的论断。沃尔夫也是研究印第安荷比语的学者。他把荷比语和 SAE(标准欧洲语)进行长期仔细地比较研究。他发现这两种语言有天壤之别,不是外壳的(语音、语调、语法、词汇),而是思维性的“质”的差别。他说:“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观点,是用数学的术语表达的关于宇宙的看法;而荷比人的世界观则是用另外的、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表述的,它是非数学的,而是语言的。”^⑤在这里,沃尔夫提出他的有名的、引起广泛争议的“语言决定论”——语言决定人的世界观。布留尔和沃尔夫,其实是各自强调了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文化心理影响了语言构造(布留尔),语言构造又强化了,甚至规范了文化心理(沃尔夫)。沃尔夫所指的“世界观”主要是认知性的,而不是被误解了的、政治性的世界观。其次,语言世界观是可转换的,不同语言所形成的世界观其实是对外部世界因观察角度、强调面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图像。“横看成岭侧成峰”,一个人从正面观山形成了印象,并不意味着他就丧失了从侧面观察而形成新的印象的可能性。相反,从正面、侧面都进行观察才会有更全面深刻的印象。正因如此,人们常说多学一门外语就多了一个观察世界

6 语 言

的窗口。

两位学者的研究说明:文化心理,作为一种文化哲理,既影响语言构造,又受到语言构造的制约和强化。由此可见文化生存形态是如何通过它所孕育的文化哲理既规定语言构造,又通过语言展示自己风貌的现实。

二、文化形态与语言哲理观

原始人,尤其是渔猎文化生存形态中的原始人类,是从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均未和自然分离的“自然之子”。各种动植物以最具体的、千姿百态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在对这些动植物的简单摄取过程中,具体形象的识别比抽象概括更重要。这里仅需要具体的思维。原始人有意识地追寻猎物,并与猎物骤然相遇,或不期而遇时更多地依赖于随机应变和建立在经验上的直觉反映。在这样的情况下具体思维比缓慢的抽象思维更有用。原始人的人际问题相对简单,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面对来自自然的问题。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原始人自然地、不知不觉地会产生偏爱具体思维的文化心态。而这样的文化心理显然影响了他们的语言构造。同时他们的语言又显现了他们的文化生活面貌。

西方民族的先民们所生活的地方,自然环境相对严峻。古希腊的土地十分贫瘠,既不适合于渔猎,也不宜于大规模的农牧。山河零碎,海洋环绕,自然与人之间已有了距离。一定的距离是概括观察以求真知的条件,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与自然的距离感是孕育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文化心态的温床,也是促使抽象思维形成的沃土。严峻的环境使希腊人把生活方式重点放在跨海经商、外掠殖民、建造船只、远洋航行、进行战争和与其他民族争城掠地上。这样的生活客观上对抽象思维的需要更胜于具体思维。正是这样,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民族就注重形式逻辑、抽象思维,力求从独立于自我的自然界中抽象出纯形式的观念,表现出强烈的对自然的干涉主义,要自然适应人的倾向。这

样的文化心理促使西方语言具有较丰满的外露形态系统,句法呈明显的干涉主义的特点。

汉语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中国文化的舞台是十分广袤的大河平原,其间散布小片小片的森林和恢宏辽阔的草原。气候温和,但土力不肥,大河时常泛滥。马克思说,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茂盛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化。因此中国文化的地缘因素意味着它具有强大的多元经济发展潜力。但是,中国的地理特点也具隔绝性:高山、大海、沙漠,把中华文化局限、包围在落后的农牧民族之中,与异质性的西方文明十分隔离。这样的环境形成了中国独具一格的文化生存形态,即在家国同构的专制政府引导下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的基础上的小农农耕文化。中国文化哲理有这样的特点(仅与本文有关的):(1)天人合一,人主动地适应自然而达和谐;(2)阴阳相济的辩证观;(3)克己复礼,讲求等级顺序、自我内审和集体至上。从这三个特点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哲理的思维是以主观领悟为特征,即从整体上主观把握而不作客观的分析。主观领悟式的思维是一种将具体思维与抽象思维有机结合的具象思维。

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以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⑥王国维看到了中国人注重具体的知识,而忽于理论的历史。但是中国哲学15~16世纪在欧洲传播时,使欧洲学者,如莱布尼兹、福尔泰大为佩服的,却是中国哲学的精细抽象。

申小龙先生指出:汉语的语言哲理倾向是一种具象思维,是一种充满主体感受和体验的哲理思维。它包含几种特点:(1)观物取象,即在观察事物时将事物分摄为便于整体主观领悟的板块而形

成生动形象的心理图象。所谓,“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西方哲理也重观察,但目的是将事物分析为抽象的元概念和原则以便于逻辑推理。中国哲理中的“观察分摄”包含着抽象思维;“索图取象”则是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有机结合。高名凯说:“中国语言是表象主义的,是原子主义的——‘表象主义’就是中国人的说话,是要整个的,具体的,把他所要描绘的事件表象出来。‘原子主义’的意思,是把这许多事物,一件一件的,单独的排列出来……”^①(2)虚实相间,即讲究“神”与“形”之间的相反相成的关系而达于形神兼备的和谐美与经济简便的思维倾向。这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是既“务实”又“务虚”,阴阳相和的,即追求抽象思维与具体思维间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文化心理极大地影响了汉语的语言构造。

三、汉语、英语的语言构造

1. 汉英文字学(graphetics)特点

文字是一种书面语符(written sign),属符号学(semiotics)的研究内容。根据美国符号学者皮尔斯(C. S. Pierce)的观点,人类形成符号的过程是一个由具体临摹逐步抽象而成符号的,其间形成三种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的记号:图形记号(icon)、索引记号(index)和象征记号(symbol),又称“符号”。图形是这样一种记号:它指称仅仅依据记号自身的特性而指谓对象,即它与其对象之间有临摹性的相似性,如图画与它所描绘的事物的相似性使该图画成为该事物的图形记号。索引记号是这样一种记号:它指称依据它真实地受到其作用而指谓对象,即它与其指谓对象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交通指示图就是它所指谓的实际交通路线的索引记号。象征记号是这样一种记号:它仅仅或主要地依据它如此被使用和如此被理解而成为指谓记号,即它与其指谓对象之间存在一种约定俗成的任意的关系(外在的关系)。许多语言词汇就是这样的记号,被称为语符。简而言之,符号形成是从形似到内在指

示,进而到外在指示。

文字的形成也大致有这样对应的过程。雅可布·布洛倍夫斯基说,语言就是把世界分解成各个部分,又把它像活动图象似地重新组合起来的一种方式。象形的图画文字就是人类都曾使用过的语言图象符号。图象符号笔画简单化而成较抽象的索引语符,更抽象的简化必然使索引符号的内在指示性淡化而逐渐形成外在指示性的象征语符。西方文化的抽象思维倾向使其语符形成的过程大约遵循了这样的过程:图象语符—索引语符—词素化—音节化—字母化—音素。从词素开始,西方语言大多转向了表音文字的方向,告别了象形的阶段。

汉文化的具象思维倾向和中国文化固有的因素使汉字徘徊于象形指意的阶段。中国文化的哲理推崇复古,文字不仅是言语交际的工具而且是维系文化传统的重要工具。这就要求汉字具“垂后识古”的特点。象形指意文字可以让人“望文生义”,无疑是能达到“垂后识古”目的最理想的文字。这样的文化心理使汉字不仅应是语符而且应是一种文化索引符号。

汉字是由更简单的部件构成的。这些部件本身就是带有音和意义的象形记号的抽象简化。这些部件的组合方式常常能精妙地传递语义所无法直接传递的文化信息。在许多情况下,是某种文化因素规定了部件构成的方式。因而这些部件的构造方式能反映这样的文化信息。汉文字的部件构造方式是多种的:上下重叠、并列、上中下重叠、外包、内包等等。有个日本学者声称,每个汉字都是一个集成线路。

如“葬”字。它作为语符能表示“将死者按一定的方式安埋”。但是它上为“草”,中为“死”。上为“草”的部件构组形式具象性地图示了远古时期中国草葬的方式,从而以其构造形式传递了文化信息。这就使该字不仅是语符而且是文化索引符号。决定该字的构造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因素。又比如“仁”。“人”旁本身就是人的简化图示符,“二”也是具体的图示符,两者并列而表“人际间的同情或友情”;同时以其构造形式传递中华文化“仁者爱人”的文化哲理。该字的形与义之间是内在关系而非外在关系,因此是文化索

10 语 言

引式的语符。在汉语里这样的字是不胜枚举的。

英语和汉字相对照的语言单位是词素(morpheme)。它的构造部件是字母。字母显然是仅仅表音的符号,无法传递任何文化信息。这就决定了英语词素作为“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所能传递的“义”是十分抽象的。当然许多自由词素(free morpheme)的意义是相对具体的。但是它们也无法“望文生义”地传递语义,更谈不上传递文化信息。只有借助于词源学的研究,西方人才能由语言来探索文化信息。

2. 汉英词汇构造的特点

中国文化的具象思维倾向不仅影响文字,还对语音构造组合形式产生很大的影响。语言词汇里最关键的是音节构造,它是词汇和句子的物质外壳,也是词汇形成的巨大约束力。汉语的一个音节以一辅音加一元音为基本构造,使每个音节都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似乎与中国阴阳相济的哲理观一脉相通,也和中国文化讲究虚实相和的倾向相一致。这样的音节特点不便于汉语词产生附加的抽象语法形态词缀,却有利于汉语以一字为词。音节特点还使汉语的语音在阴阳声韵、音声高扬低抑方面都呈现出一种讲究相间有序、虚实相应的倾向。这也和阴阳相济、虚实相间的具象思维倾向不谋而合。语音风格与文化心理相互烘托,决定了汉语词汇以双音节的双字词为主要格局。四音节的四字成语几乎在成语中独霸一方。

由于汉语的字是由各种部件构成,各部件本身就是音义结合并且载有文化信息的符号。于是一个字就已经具有词的语法构造功能和明确的语义。双字词(相当于英语的复合词)是单字词虚实相和的音节韵律的复制和延续。单字的文化索引性也自然引导到了词汇层。文化哲理倾向也仍潜在地作用于词汇构造。“国家”用来表达“社会政治机构系统”。它的构造组合和中国“家国同构”的文化政治传统似乎有关。四字成语是双音节词的韵律的重复延续。吕叔湘指出,在现代汉语里,尤其是书面语中,这种双音节偏向更为突出:

进行试验 管理图书 调查事实 平凡人物

隐喻是一种将抽象事物和观念转化为具体形象的修辞方法,与具象思维心理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汉语中有许多“固定隐喻”,如“鲸吞”、“蚕食”、“落花流水”、“龙飞凤舞”等等。这样生动形象的固定性隐喻词在汉语里使用广泛。这充分说明中国文化的具象思维使汉语具有十分丰富和生动的表现力。

此外,辩证的具象思维还使汉语将反义词并列,让词义之间相反相成而产生出更抽象却更生动的意义:“东西”、“天地”、“是非”、“深入浅出”、“舍近求远”等等。同样的思维倾向也使汉语将同义词并列,语义一虚一实,达到更形象的概括:“街道”、“光明”、“熙熙攘攘”、“浩浩荡荡”等。

宋永培先生的文化词汇学专著则拟探索中国文化的“天人合德”思维哲理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汉语词汇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这是从更深、更系统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哲理对语言构造的作用。本文不在此赘述。

英语词汇有形态特点,除一些自由词素可单独成词外,大多数词是由抽象的词缀附加于词干构成。enrichment = en + rich + ment,“en”“ment”是表示抽象的语法意义的词缀,体现了西方文化倾向于从事物中抽取基本的观念,然后再人为地重新组合这些观念的倾向。这与中国偏重于形象组合、顺从自然的倾向恰成对照。西方词汇的文化信息难以从词形构造中直观地“望文生义”地获得。

隐喻当然也是英语常用的修辞手段。但是却没有像汉语那样的固定隐喻。不过英语可以通过语法的词性变化来使用隐喻修辞:He ducked his head. (他像鸭子般地埋下头来。)英语里也有许多使用具体思维的情况,如拟声词:neigh (马嘶),bleat (羊叫),cuckoo (用布谷鸟的叫声指称该鸟)。在科技词汇里,用具有实义的词素来组成词也是普遍的,如“hydro + gen”,“syn + thesis”。这些都说明,在英语里具体性思维并未完全消失。

随着中国文化生活形态由纯粹的农耕向多元的方向发展,普通民众文化活动蓬勃兴起。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东渐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并引起文化思想的激烈变革。变革的